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84-53
3

9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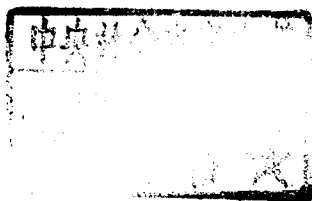
DF68/06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20001558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24.375 印张 62 4千字

印数 00001—1200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603-7/A·3 定价: 26.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于 1993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学术讨论会。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运用和发展的光辉结晶，是党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得到各社会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共收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全国 33 个社会科学院（所）学者们提供的论文 208 篇。限于会议规模，经专家们评审，有 74 篇论文入选。这些文章，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等不同领域，比较集中和深入地探讨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展示了新时期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出席了这次讨论会，并作了题为《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的学术报告。我们谨以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

论文原篇幅一般在1万字左右。收入文集时，又请作者作了一定程度的压缩。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将与会的74篇论文全部收入，并尊重各篇论文的不同观点和风格，只作了部分文字技术性处理。

这次会议的论文征集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负责。直接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援、王正、刘白驹、朱渊寿、宋家鼎、周志宽、周明俊、章绍武、曹荭、黄浩涛、葛良志等同志。文集的编排和体例由黄浩涛负责。参加征文组织、审选或校对工作的还有朱崇利、温伯友、沈志坤、王春生、李春林、金泓、韦莉莉等同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1994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代序)	胡 绳 (1)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 探索和巨大贡献.....	荣开明 (16)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	姚 辉 (27)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张远成 (38)
毛泽东对我国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王立行 (47)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	周振华 (58)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	马仲良 (68)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 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兼评迈斯纳《毛 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	谢 霖 (79)
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轨迹的分析.....	王煜 周晓英 (91)
赶超资本主义的世纪之战 ——论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解力平 (104)
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理论及其发展	王毅武 (114)
论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吕 政 (125)
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马泉山 (134)
以农业为市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关键	丁泽霖 (144)
按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规律办事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王贵宸 (153)

“八大”前后毛泽东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

设想始末 董志凯 (163)

论毛泽东的经济管理思想 曾德盛 (176)

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陕

甘宁边区的提出与实践 朱 凯 (185)

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初探 肖周录 韩松 (197)

历史与现实 战略与战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及其走势 ... 余育德 (207)

《论十大关系》到“南巡谈话”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 汪玉奇等 (217)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

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经济思想初探 施学光 (227)

邓小平在农民(业)问题上对毛泽东思想的

继承与发展 孙自铎 (238)

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地位 房良钧 (248)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刘 奔 (257)

“精髓”论 石来宗 (268)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成道路 李景源 (279)

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國化 邝柏林 (290)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时间新探 王兴国 (304)

毛泽东的矛盾观与矛盾分析方法 苗启明 (315)

试探毛泽东处理矛盾的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 张景荣 (322)

毛泽东哲学实践论及其中国思维特色

——知行、实践和主体性 滕 复 (330)

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初探 戴清亮 (339)

光辉的哲学遗产

——试论毛泽东的“结合”思想	胡振平 (349)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及其传统文化背景	王凤贤 (359)
学习毛泽东建国后关于逻辑的思想	诸葛殷同 (370)
“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研究	
历史的评析	徐素华 (378)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陈 辽 (389)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张国民 (399)
人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征	庄锡华 (411)
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论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理论	马晓玲 黄南珊 (420)
毛泽东论文艺的民族特色	吴元迈 (429)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管理学的贡献	王维国 (441)
试论毛泽东艺术创造与审美感兴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蔡子潆 (451)
论毛泽东与诗	吴 蓓 (460)
毛泽东诗论与新中国诗歌	张 炯 (469)
毛泽东与“形象思维”理论	刘欣大 (481)
试论毛泽东借鉴外国文艺的思想	李学英 (491)
论毛泽东与历史科学	叶桂生 (502)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战争观的批判继承	谢宝森 (512)
毛泽东与东北解放战争	刘信君 (520)
坚持毛泽东思想,繁荣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万 峰 (530)
毛泽东与考古文物工作	石 先 (540)
毛泽东和地方志	魏 桥 (551)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贡献	杨海蛟 (559)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贡献	刘 瀚 (570)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刘宝三 (581)

毛泽东廉政思想新探	俞佐萍 (591)
毛泽东关于防止执政党腐败的理论与实践	邓剑秋 (599)
试论毛泽东关于劳动改造罪犯的思想	王友才 (609)
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与中西文化散论	曾成贵 (618)
论毛泽东大革命时期领导权思想的特点	李 吉 (627)
试论毛泽东的谋略思想	么大中 (637)
略论毛泽东领导观和领导方法论	田其治 (644)
社会大变革中的文化方略	
——为文化巨人毛泽东百年诞辰而作	孙广举 (652)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	章百家 (661)
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与谋略思想	郝润昌 (670)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加强民族团结	
——学习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	
的理论和实践	伍新福 (679)
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的发展	杨荆楚 王戈柳 (691)
论毛泽东的农民观	白 钢 (702)
毛泽东重视农民利益思想的启迪	李鸿飞 (716)
试论毛泽东的宗教观及其特点	郭 林 (726)
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马光仁 蒋金戈 (736)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及其对马克思	
主义教育学说的贡献	邵和平 (748)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国外	韩荣璋 王宜秋 (759)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代序）

胡 绳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在 1949 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 1943 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以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

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40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

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①。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②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③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小。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页。

② 同上，第803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为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② 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共产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③ 这就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同志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④ 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1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邓小平同志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①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1965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②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04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44页。

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解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